

缘何企业逆周期进入市场

——基于税收激励的视角*

赵颖 贺天祥

内容提要: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的逻辑难以解释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大量出现和关联性日益增加的现象,而税收激励的逻辑能较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2006—2008年年度企业注册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2008年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产生的税收激励为契机,通过年月DID设计思路,分析并证实了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研究发现:(1)税收激励显著促进内资企业进入市场,我们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2)促进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在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并增加了企业关联;(3)税率统一政策产生了偏向型效果,规模更小和环境更友好企业进入数量明显增加,同时企业退出数量减少;(4)企业内外部关联度在此过程中开始增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出现了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其中外资企业更普遍。本文较好解释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逆周期出现和企业关联度增加的特征事实,为进一步理解企业出现的逻辑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帮助。

关键词:企业出现 税收激励 企业关联 资源配置

作者简介:赵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研究员,430073;

贺天祥(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430073。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11-0020-19

一、引言

企业缘何进入市场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一般而言,企业出现的内在逻辑在于社会分工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管理市场和干预分工视角的消失中等企业:特征事实、内在机制和优化路径”(723742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保缴费负担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政策优化:基于征收机构改革的视角”(720742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减税降费的财政成本和社会效益:影响评估、作用机制和优化路径”(72073144)。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贺天祥电子邮箱:tianxiang2324@163.com。

细化(Smith, 1776)和交易成本降低(Coase, 1937)。分工实际上是企业在劳动专业化带来收益程度和由此产生协调成本间的取舍(Becker和Murphy, 1992),这和Coase(1937)提出企业分工的边界在于平衡内部生产边际成本和外部交易边际成本的思路一致。近期研究发现公共政策能促进社会分工(陈钊、王旻, 2016)并降低交易成本(De Neve等, 2021),同时我们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立的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增加^①,企业关联度日益增加(Bai等, 2020; Brandt等, 2022)。这无法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企业出现是否存在公共政策维度的逻辑?

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分工理论可以回答企业数量增加的原因,但难以解释中国企业逆周期进入和关联性增加的特征事实。就交易成本理论而言,Coase(1937)认为企业分工边界在于平衡内部生产边际成本和外部交易边际成本,即企业需要考量分工的成本与收益。交易费用只是企业发展的原因之一,仅使用单一视角的分析逻辑,就容易忽视其他领域对企业发展的潜在影响。就社会分工理论而言,斯密定理指出市场规模大小决定社会分工范围。然而,市场规模与国家财富和人口数量密切相关,因此分工程度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Smith, 1776),我们很难期望既定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社会分工理论无法解释生产组织间关联和整合现象,也就难以解释企业逆周期出现和关联度持续增加的原因。因此,我们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寻找企业逆周期进入市场和提升关联度的原因。

在诸多公共政策中,税收的影响毫无疑问最为深远。税收制度的制定与调整不仅对社会各项功能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IMF, 2015; De Neve等, 2021),还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Bloom等, 2013)。上述分析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税收政策社会效益的认识存在不足。现有针对税收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存续企业,关注这类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Dwenger和Treber, 2022; 赵颖等, 2023)、经营决策行为(王伟同等, 2020)和税收归宿问题(Fuest等, 2018),这不可避免地存在幸存者偏差问题。税收的作用不仅在于改善存续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可能有助于企业出现,这两方面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二是税收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和弘扬企业家精神^②,而非使部分企业产生政策依赖。如何促进企业家精神^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这需要国家在执行法律和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Smith, 1776)。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推动上述能力不断实现的过程。

2008年,中国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合并(以下简称“两税合并”),为我们识别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随着该项法律的实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从33%降低至25%,外资企业的税率也从15%或24%逐渐提升至25%,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这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成为近年来针对全部市场主体最大规模的所得税减税激励。该政策对我们研究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该项政策更容易落地。减税降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促进政策落地,即促进市场主体充分享受到减税降费的政策

① 2007年每月新进入企业数量为43000家左右,2008年这一数量接近52000家,显著高于2007年月度均值。

② 这两方面是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详见《习近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新华网,2020年7月21日。

③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综合能力的表现(朱贻庭, 2013)。近年来中国市场主体呈现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总量增速快。2012年“营改增”以来,中国新增市场主体年均增速在20%以上。二是税收影响大。旨在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税收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导致大量企业扭曲政策意图进行避税。中央层面也多次强调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详见《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六》,《人民日报》2021年12月6日。

红利。^①两税合并的改革来自法律层面,是目前减税降费立法层级最高的来源,且面向所有市场主体,因此针对主体具有普遍性和政策落地存在有效性。二是减税力度大。改革导致政策执行后首月内资企业所得税增速从40%左右降至-17%^②,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减税激励。这是至今针对企业所得税最大规模的减税且适用于全部市场主体,为我们识别所得税减税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三是该政策能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企业出现的影响。两税合并政策实施时间,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时期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并不存在促进企业进入的市场因素。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我们通过获取2006—2008年每天成立的全部市场主体名单,以2008年两税合并为契机,分析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即所得税减税激励如何促进企业出现。由于我们的样本覆盖全部市场主体,因此并不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我们在年-月-城市-两位数行业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出现。由于2008年存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其他类别的市场主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总量萎缩的趋势,企业逆周期出现的数量增加证实了税收逻辑成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因素。我们排除了西部大开发、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这种税收解释企业出现的逻辑依然成立。我们使用2003—2005年的数据进行趋势性因素检验,否认了企业数量趋势性增加对我们结论影响的可能性。

本文从两个方面证实了内在影响机制。一是税收负担渠道。我们使用2003—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两税合并导致企业所得税率下降,这与Fan等(2018)的发现一致,意味着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减少是促进企业进入的重要原因。二是企业关联渠道。我们发现两税合并改善了企业的内部关联和外部关联网络,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Brandt等(2022)发现中国关联企业增加的特征事实。我们发现新出现的企业规模较小,产生了一定的就业创造效应。

本文的贡献在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税收角度解释企业逆周期出现的逻辑,完善了现有文献从社会分工(Smith, 1776)和交易成本(Coase, 1937)解释企业出现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降低均成为公共政策产生效果的表现形式。如以“营改增”为代表的减税激励促进了企业间分工合作(陈钊、王暘, 2016; 赵颖等, 2024),以国税局和地税局合并为代表的制度建设减少了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在此意义上,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更具一般性。二是我们研究所得税的减税激励,区别于现有文献从流转税减税激励出发的研究视角(范子英、彭飞, 2017)。虽然现有文献从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角度研究了所得税减税激励(王伟同等, 2020; 李昊楠、郭彦男, 2021),但适用主体的有限性和政策落地范围的受限性都影响了这种税收激励的实际作用。三是本文构建的样本包括了所有市场主体,解决了以往研究对象为特定类型企业的局限。如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樊勇等, 2020; 杜鹏程等, 2021)。具体而言,我们获取了2006—2008年年度全国工商登记数据和税务信息数据,包括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中大型企业,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① 以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为例,根据CMES的《小微税收政策研究报告》,2015年有近60.3%的小微企业未关注或听说过相关税费优惠政策,22.5%的小微企业并不知道当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内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如果按照此比例推算,2015年实际享受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企业比重将由59.98%降至46.49%。这种理论和实际覆盖主体的差异,同样为减税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实际上,2015年真正享受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企业比重为8%,远低于理论层面的估计。

^② 我们将在后文中指出,由于纳税主体的增加,这里-17%的增速仍低估了减税效果。

二、制度背景和文献述评

(一)制度背景

中国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建构逻辑,是按照先分类后统一的方式。这种逻辑不仅体现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进行所得税制度建设后逐步统一,还体现为两类企业内部也按照从分类走向统一的方式进行制度建设。^①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消除了内外资企业的差别税收管理模式,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成为构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制度保障。

就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建构而言,1980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固定合营企业所得税率为30%,并将应纳税所得额的10%作为地方所得税进行征收。198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外国企业所得税率设定为20%~40%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1991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合资经营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企业所得税率设定为30%,同时地方所得税率为3%。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更低。至此,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了内部统一。

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发展主要始于1983年的“利改税”。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中规定对大中型企业征收55%的所得税率,小型企业等征收10%~55%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执行35%的税率。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所得税率为33%。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改革始于1993年并于2007年完成。1993年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统一企业所得税”。同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也提出“统一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方向。虽然2004年财政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中断,直到2006年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于2008年实施。至此,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25%的企业所得税率。虽然两税合并前外资企业名义税率为30%,但有1/4外资企业适用的税率为15%^②。为减少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上升的影响,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针对外资企业的5年过渡期办法。

(二)文献述评

企业出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表现(朱贻庭,2013),不仅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还包括企业进入市场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新进入高生产率的企业密切相关(Brandt等,2012;赵颖等,2024)。近年来中国市场主体呈现的一个典型特征为总量增速较快,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数量不减反增。随着中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减税激励政策的出台,新增市场主体年均增速在20%以上。^③

影响企业出现的因素较多,现有研究主要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从社会分工角度。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Smith,1776)。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 《中央财大刘桓:两税合并不会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 https://www.gov.cn/zwhd/2006-11/13/content_440506.htm。

③ 我们依据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计算得出。

在中国,企业所有者创办多家企业的现象日益普遍,这类企业家创办的企业更具生产效率、使用的资金规模更大、公司规模也更大(Brandt等,2022)。现有研究指出关联企业增加成为企业分工的重要形式,从资源配置(Hsieh和Klenow,2009;Bai等,2020)、产权保护(Lerner和Schoar,2005)和生产率提升(Brandt等,2012)三方面尝试解释这一现象,并从产出动态和收入分配效果(Jones和Kim,2018;Becker等,2019)评估这种现象对企业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为企业分工的重要形式之一,企业内分工有助于生产率的提升。

二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企业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内外部交易成本间的权衡(Coase,1937,2013)。为减少交易成本,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推动制度建设。政府不断提升法治环境和增加对产权的保护都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在此情况下就会促进企业出现(Baumol,1990;Acemoglu和Johnson,2005)。这有利于企业最小化进入成本,以此获得进入市场的最大化利益。

虽然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两种研究思路能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企业出现的原因,但现代政府日益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也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营决策,甚至使企业进行跨国利润转移以规避税收负担(刘志阔等,2019)。一个典型的特征事实在于,企业往往会在税收政策断点附近形成聚束(Hsieh和Klenow,2009;樊勇等,2020)。虽然在企业出现的因素中税收影响日益重要,但目前的经验证据更多仍在分析税收政策对存续企业的影响,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现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且结论尚未达成一致。现有经验表明,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税收对企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Levy,2008;Bloom等,2013;赵颖等,2023)。因此,从税收角度能否解释中国企业逆周期出现的特征事实,成为本文关注的重要问题。

通常而言,流转税的税负归宿并不是企业,流转税负高低仅对企业现金流产生影响,此方面的减税也主要基于释放企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企业所得税则由企业实际承担,对企业的影响也逐渐开始被认识。近年来,基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开始出现,切入点往往是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王伟同等(2020)发现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促使部分小微企业进行应纳税所得额操纵,从而获得更多的减税红利。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李昊楠和郭彦男(2021)认为减税可以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水平。赵颖(2022)则分析了减税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发现该政策促进了社会就业增加。

企业进入壁垒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出台前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企业进入面临诸多壁垒,其中,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为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这既包括地理等自然因素会造成自然性市场分割(沈坤荣、余吉祥,2011;沈剑飞,2018),又包括地区间进入制度壁垒(叶宁华、张伯伟,2017)。因此,如何减小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率方面的差异,成为企业决定是否进入市场考虑的重要方面。

我们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促进企业通过增加关联进入市场的分析逻辑有助于解释企业逆周期出现的特征事实。就企业逆周期进入而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缓解了内资企业在市场上面临税率较外资企业更高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额外优势,这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家预期的方式,促进企业逆周期进入市场。就企业关联而言,我们将社会分工理论对企业的分析从独立个体转变为协作互联的组织,企业不仅在内部进行分工,还通过关联企业间的协作生产进行集团内的分工,这两种方式都区别于市场分工。

综上所述,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企业出现的原因。在诸多公共政策中,税收对企业的影响覆盖所有市场主体并影响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影响企业发展最深远的公共政策,势必对企业出现具有重要影响。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难以从税收角度解释企业为何出现,

仅关注对现存企业的影响,这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成本收益认识存在不足,也使得未来出台相应政策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以2008年中国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契机,尝试从税收角度分析企业出现的原因,以完善现有分析的不足,为理解企业出现提供一般性的视角。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两套数据。第一套是日度企业注册数据。本文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6—2008年每天设立全部市场主体的名单,通过手工方式逐一与企查查和天眼查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包含企业注册信息在内的数据集。由于所有市场主体均需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登记,因此,该数据具有覆盖主体的广泛性和信息的完备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这类数据分析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Allen等,2019;Bai等,2020)。根据研究目标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如下筛选:(1)由于分析法人主体的公司,所以,我们将市场主体限定为公司类型;(2)剔除每年正月所在的月份;(3)在年-月-城市-行业层面对新进入企业数量进行加总;(4)匹配地级市层面宏观数据。(5)删除重复值并对极端值进行1%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75563个。

第二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由于工商数据中并不包含企业财务信息,我们使用2003—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讨论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逆周期进入市场。

(二)研究设计

区别于传统DID,我们这里DID是年月维度的。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比较既定年度和月份上变量的差异,在消除年月趋势性影响的基础上,估计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我们设计如下DID模型,分析两税合并对企业出现数量的影响:

$$Y_{cjm} = \alpha_0 + \beta_1 \times Treat_{ym} \times Post_m + \beta_2 \times X_{cym} + \eta_c + \gamma_j + \lambda_y + \lambda_m + \varepsilon_{cjm} \quad (1)$$

其中, c 、 j 、 y 、 m 分别代表城市、行业、年份和月份。 Y_{cjm}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年-月-城市-行业层面新进入企业数量。我们这里采取两位数行业进行加总,城市选取地级市。我们采用这种加总指标而非企业个体指标主要在于如下方面的原因:我们仅能观察到企业进入的结果,却无法观察到企业决定进入到最终没有进入的样本,导致从企业层面分析进入的状况存在偏差。我们假定各行业中企业决定进入但没有进入的概率是类似的,这种加总数据有助于分析企业进入数量的变化。

根据设计年月DID的思路,我们将不同年度相应月份进行对照,从而估计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我们将 $Treat_{ym}$ 定义为如下虚拟变量:2006年7月—2007年6月为控制组,赋值为0;2007年7月—2008年6月作为处理组,赋值为1。由于两税合并政策在2008年1月实施,我们将 $Post_m$ 定义为2008年1月以后的虚拟变量。^① $Treat_{ym} \times Post_m$ 代表2008年1月以后的虚拟变量, β_1 捕捉了两税合并实施对新进入企业数量的影响程度。 X_{cym} 是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层面GDP总量、第二和第三产业结构、劳动力数量、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工资。 η_c 是城市固定效应, γ_j 为行业固定效应, λ_y 和 λ_m 是年份和月份固定效应, ε_{cjm} 是误差项。

^① 虽然《劳务派遣暂行规定》通过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颁布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实施时间为2014年3月1日,我们在后文分析中将检验这里设定的合理性。

四、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

(一) 基准结果

我们将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影响的结果归纳在表1中。第(1)列仅控制了年份和月份固定效应,发现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具有促进作用,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我们在第(2)列中继续控制了城市与行业固定效应,发现这种影响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地级市的控制变量,包括GDP等指标,我们发现企业进入仍显著受益于两税合并政策的实施。

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产生积极效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减税激励较大。两税合并政策将名义企业所得税率从33%降低至25%,对在中国大陆注册企业具有较大的减税激励。二是政策实施效果更好。两税合并是法律层面上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区别于其他层级的减税激励,政策落地情况显著好于其他政策。

表1 两税合并与企业进入

变量	(1)	(2)	(3)
<i>tme</i>	0.8066*** (0.1112)	1.0777*** (0.1996)	1.5489*** (0.4668)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样本量	175563	175563	175563
adj. R ²	0.0817	0.0820	0.0823

注:*tme*代表方程(1)中 *Treat* 和 *Post* 的交互项。标准误 cluster 到两位数行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政策对现有企业的影响,如资源配置过程(杨国超等,2020)、税收分成的投资激励(刘勇政等,2021)和公共政策间的协调性研究(贾俊雪,2012),但缺乏对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决策的分析,这关注了公共政策对企业集约边际的影响,但忽略了对企业扩展边际的影响,显然低估了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我们的结论有助于补充此方面文献分析的不足。同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现的增加,也难以使用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的逻辑进行解释,税收政策的变化成为企业出现的唯一逻辑。在此意义上,企业出现存在重要的税收逻辑。

(二) 稳健性分析

针对基本分析中的结果,我们在此部分中从如下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检验平行趋势、排除多重改革的影响、加总层级和聚类的影响、剔除未观测因素和趋势性因素的影响。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即为平行趋势检验。按照事件研究法研究思路,我们逐月设置月度虚拟变量,并将改革前第1个月作为参照组,对改革前后各月份受政策影响程度进行了估计。

$$Y_{cjym} = \alpha_0 + \sum \beta_t \times Treat_{ym} \times Post_m + \beta_2 \times X_{cym} + \eta_c + \gamma_j + \lambda_{ym} + \varepsilon_{cjym} \quad (2)$$

方程(2)的指标定义方式和方程(1)基本一致,其中 $Post_m$ 代表 y 年7月到 $y+1$ 年6月的月份虚拟变量,其中改革前的一个月,即上一年12月作为对照组被删除。^①按照1月为改革当月,我们发现改革前月度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及其置信区间与 $y=0$ 存在交叉,代表这一时间就业数量的变化并不显著区别于0,两组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差距。此外,这一时期的影响不具有趋势性的变化,具有较好的平行趋势。

2. 多重改革的影响

潜在多重改革影响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之一,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处理。一是调整估计的窗宽。我们将样本限制在改革前后各一个月,在此期间内不存在其他类型改革,由此得到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局部估计结果。我们发现这种结果小于基准分析结果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排除其他类型改革对本文估计结果有限(见表2)。二是通过调整改革时间。我们将政策实施时间调整为2007年10月后,发现对企业进入并没有促进作用,这就排除了潜在政策的影响。

同期存在的三项改革对我们识别会存在一定的影响:一是西部大开发政策,二是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三是企业所得税免减半政策。由于中部省级单位和西部大开发区域存在一定范围的重合,以及中部地区存在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城市,我们将样本限制在东部省级单位中,以避免上述两项政策的潜在影响。在调整后的样本中,我们仍发现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的积极影响。就企业所得税的免减半政策而言,也会对企业实际税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估计出现偏差。我们归纳和整理了政策执行时间在我们样本期间的10项免减半政策,删除符合上述政策范围内的企业,并将剩余企业限制在制造业、建筑业和零售业三类行业中。我们在调整后的样本中仍然发现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存在积极影响,意味着同时期的免减半政策对我们估计的影响有限(见表2)。

3. 加总层级和聚类的影响

我们主要关心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加总层级的影响。我们将加总层级调整年-月-城市-一位数行业,仍发现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存在积极影响,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二是聚类维度的影响。我们调整聚类到市级和行业两个层面上,同样发现对企业进入的积极影响(见表2)。

4. 未观测因素影响

虽然我们排除了同一时期潜在多重政策的影响,但我们仍无法说明结果是由同一年度内无法观测因素所导致。两税合并政策仅针对企业实施,我们需要选择市场上非企业主体为研究对象。在诸多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中组织类型不是企业,这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我们发现两税合并并没有促进个体工商户数量的增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减少的现象(见表2)。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市场主体趋势性增加的现象,企业进入的增长是由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带来的。

5. 趋势性因素影响

我们在这里进行排除趋势性因素影响分析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检验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是否存在各年度间的趋势性影响;二是进一步验证市场主体是否存在趋势性增加的现象。我们选取2003—2005年为分析样本,并重新寻找和匹配了企业相关信息,发现这一时期假定改革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这说明2008年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具有排他性。我们同样发现个体工商户不存在趋势性增加现象(见表2)。

^① 结果未列示,留存备案。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窗宽=1	(2) 2007 年 10 月 实施	(3) 排除 两项同期 政策	(4) 排除 免减半 政策	(5) 一位 数行业	(6) cluster 到市级行 业层面	(7) 个体 工商户	(8) 2003— 2005 年	(9) 2003— 2005 年 个体工商户
<i>tme</i>	0.8888*** (0.2643)	-0.1999 (0.1245)	0.9998** (0.4033)	0.6069*** (0.1331)	29.165*** (7.9650)	1.5489* (0.8339)	-1.0560 (1.5937)	0.0368 (0.1558)	0.2919 (0.5622)
年份、月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225	175563	71011	66228	11958	175563	175563	150781	11294
adj. R ²	0.0872	0.0823	0.0737	0.0723	0.1518	0.0823	0.0823	0.0809	0.0575

(三) 政策偏向型特征

1. 规模偏向型的特点

虽然企业所得税对市场全部企业按照统一税率进行征税,但现有研究表明小型企业税负高于中大型企业。^①那么,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对哪种类型企业进入影响更大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样本中并不包含企业经营规模等指标,但我们可以通过增值税领域的纳税人身份制度进行划分。^②虽然两税合并对中大型企业进入影响较大,但对小规模企业进入的影响程度更大(见表 3),这意味着法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实际上产生了偏向型政策效果。从行业分布特征来看,我们发现,批发零售业是这类市场主体进入较集中的行业。这不仅能解释中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数量逆周期增加的现象,也能解释中国近年来小规模市场主体增速更快的现象。

2. 进入企业污染是否更多

一个潜在的担心在于,两税合并是否导致企业粗放式进入。我们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确定污染行业,将样本分为污染行业和非污染行业。我们发现,两税合并没有促进污染企业的进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企业的进入。同时,非污染企业的进入数量显著增加(见表 3),说明该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导致企业进入以污染环境为代价。

3. 多进入还是少退出

如果一方面政策促进企业大量进入,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企业大量退出,那么这种政策影响仍是有限的。为此,我们需要关注两税合并是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导致了企业退出。我们发现两税合并没有导致企业退出增加(见表 3)。这再次说明税收政策对企业出现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忽略这一方面的影响,将导致我们难以全面认识税收政策的社会效益。

^① 根据 CMES 关于《小微税收政策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2014 年纳税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微企业为 3.9%,这显著高于上市公司的 2.5%。

^② 纳税人身份制度是中国税收制度中的重要特点,据此实现不同类别主体间的差异化管理,使税收制度更具有灵活性。这种身份管理制度不仅存在流转税种里,也存在所得税种中。中国纳税人身份管理制度存在逐步从分离转向融合的趋势,同时纳税人分类标准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转变。从 1994 年设立该分类管理制度,经由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修订,再到 2012 年“营改增”过程中的调整,纳税人的分类管理制度日益完善。

表3 政策偏向型特征

变量	(1) 小规模企业	(2) 中大型企业	(3) 污染行业	(4) 非污染行业	(5) 企业退出
<i>tme</i>	1.1012*** (0.1828)	0.3726** (0.1688)	-0.3357* (0.1674)	1.3306*** (0.2325)	0.1385 (0.1433)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4104	76157	31432	144131	134823
adj. R ²	0.0868	0.0819	0.2120	0.0887	0.0797

五、机制分析和进一步讨论

我们将在此部分中就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激励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尝试从所得税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关联度不断增加的现象,以及对企业资本和劳动配置决策的影响。两税合并中的重要问题在于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我们也将在此部分中进行讨论。

(一)内在机制

我们认为两税合并促进企业进入存在两种机制:一是税收负担机制,即两税合并有可能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成为企业进入的内在机制;二是企业关联机制,即两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关联网络,表现为企业内部关联和外部关联程度的上升,企业关联度的增加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机会,从而在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下改善自身经营环境。

1. 税收负担渠道

由于工商数据中缺乏详细的税收指标,我们同时采用工业企业数据进行补充分析。我们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如下筛选:(1)按照 Brandt 等(2012)构造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2)参考聂辉华等(2012)的处理办法,删除企业总资产、职工人数、实收资本、固定资产原值为负的观测值,删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这些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总资产、所有者权益为负或零的样本;(3)我们限制样本为2003—2013年,同时按照现有研究的做法剔除2010年样本;(4)我们将样本限制为内资企业;(5)我们删除企业所得税税负小于0和大于0.5的样本;(6)删除缺失值并对极端值进行1%的缩尾处理。共得到有效样本2105335个。

我们设计如下方程估计两税合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Y_{it} = \alpha_0 + \beta_1 \times Treat_i \times Post_t + \beta_2 \times X_{it} + \mu_j + \mu_t + \mu_c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i*、*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Y_{it}*为企业税负指标,主要包括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和总体税负。我们采用各类指标与营业利润而非利润总额的比重,在于后者往往存在一定的人为操纵,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方向(Beer等,2020)。我们对几类税负指标定义如下:(1)企业所得税税负,我们定义为企业应缴所得税与营业利润的比重;(2)增值税税负,我们定义为本年应缴增值税与营业利润的比重;(3)总体税负,我们采用企业缴纳的全部税金与营业利润的比重进行度量。

*Treat_i*定义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由于2008年两税合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一刀切政策,沿袭Chen(2017)的研究设计思路,我们将年份-城市-行业税负中位数以上企业定义为处理组,中位数以下企业定义为控制组。*Post_t*定义为2008年及以后为1,2008年以前为0。*Treat_i × Post_t*度量了

2008年两税合并后税负较高组企业税负如何发生变动, β_1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X_{it} 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年龄、员工人数、资产负债率、企业增加值、所有制类型、是否位于开发区、企业出口虚拟变量。 μ_j 、 μ_c 和 μ_t 分别控制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是误差项。

两税合并导致工业企业所得税税负出现了预期的下降, 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见表4), 这意味着改革前所得税税负较重企业出现了更大程度的减负。 这里的结果证实两税合并对企业税负降低具有真实影响, 并以法律意志进行推动, 不存在减税政策难以落地的问题, 这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税收激励。^①

然而, 这种结果是由市场中系统性减税带来的。 我们选择企业增值税税负和企业总体税负进行分析。 由于2008年前后两税统一仅对企业所得税率进行调整, 并不影响增值税税负, 同时这一时期仅有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会影响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并不存在其他政策对结果产生影响。 我们使用增值税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 发现2008年两税合并后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不仅没有减少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见表4)。 由于增值税税收归宿为最终消费者而非企业, 两税合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仍是降低。 因此, 我们可以排除企业存在系统性税负下降的可能性。

表4 税收负担影响渠道

变量	工业企业		
	(1) 所得税税负	(2) 增值税税负	(3) 总体税负
<i>tme</i>	-1.7068*** (0.4062)	1.1300*** (0.3911)	0.4850 (0.3814)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5335	2105335	2105335
adj. R ²	0.0006	0.0006	0.0006

2. 企业关联度渠道

我们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关联两方面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 企业内部关联性的变化, 即企业下属机构数量的变化。 企业关联的一种方式或控股下属机构, 从而使得企业关联网络不断增加。 两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关联企业, 即提升了企业内部分工水平。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企业不同机构差异的影响, 发现子公司数量并没有在两税合并后出现增加, 关联企业增加的主要动力来自其他分支机构。 其他分支机构的增加, 可能来自一般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 也可能来自分公司数量的增加。 这能最大化分支机构早期亏损所具有的税收价值, 有利于企业的进入。 企业的经营范围并非一成不变, 在某种程度上会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而进行调整。 现有研究发现, 税收激励会促使企业调整经营范围(陈钊、王旻, 2016)。 那么, 所得税对新进入的企业存在税收激励, 是否会对存续企业的经营范围产生影响呢? 我们发现两税合并后这一现象并不具有统计和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 意味着所得税激励政策不足以使企业调整经营范围(见表5)。 这种现象也是

^① 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实施时, 小微企业并未应享尽享。 政策实施第一年, 限额之上的小微企业是无法享受这种减半征收政策的。 考虑到减半征收限额较低, 仅有23.31%的小微企业可以享受该政策, 大量的小微企业仍无法享受到该政策的优惠。 此后, 减半征收限额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开始享受该政策, 到2015年比重已经上升为59.98%。

容易理解的: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对企业不同的生产、经营和服务行为征税,经营范围差异会导致适用税率存在差异,改变经营范围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享受更优惠的税率。

表 5 企业内部关联特征

变量	(1)关联企业	(2)子公司	(3)其他分支机构	(4)变更经营范围	(5)变更分支机构	(6)注册资本金	(7)就业创造
<i>tme</i>	0.0344* (0.0172)	-0.1253 (0.7518)	1.3584*** (0.4425)	0.0001 (0.0011)	-0.0001 (0.0000)	-2506.696** (940.6599)	12.9354 (13.2659)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5563	39480	166743	175563	175563	175563	175563
adj. R ²	0.0021	0.0383	0.0832	0.0393	0.0029	0.0034	0.0137

第二,企业间关联性的变化,即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关联企业数量的多少。我们按照两种思路进行分析:一是讨论两税合并更多惠及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就企业出现而言,该政策主要对内资企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意味着主要资源配置到内资企业而非外资企业中,或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对该政策的积极影响期待更大。相比之下,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没有得到促进。这进一步补充了经验证据,否定了市场中同一时期存在促进全部市场主体数量增加的因素。现有研究指出两税合并实施过程中存在典型的国有企业偏向特征,如果企业难以获得发展的资源,企业进入或出现就缺乏基础。那么,内资企业为何会在该政策实施后出现增加呢?我们按照最终控制人和股权比例,区分了关联到集体所有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私营企业以及非公司企业,发现关联到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是这类型企业出现的重要现象(见表6)。这种企业关联性的增加,有助于新进入企业通过关联方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从而提升竞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近年来企业关联度不断提升的现象(Brandt等,2022)。

表 6 企业外部关联特征

变量	(1)行业内关联企业	(2)相关企业数	(3)内资企业	(4)外资企业	(5)个体工商户	(6)关联集体和国有企业	(7)关联非国有	(8)关联非公司企业
<i>tme</i>	2.0670*** (0.5021)	-0.7239*** (0.2577)	62.0517*** (5.1431)	6.5078*** (0.3953)	0.1952 (0.2099)	61.8154*** (5.8846)	1.0153** (0.4671)	-0.1222 (0.3503)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5376	36814	123786	12734	2324	103632	24653	7961
adj. R ²	0.1690	0.1721	0.1812	0.1620	0.3011	0.1703	0.2210	0.1491

注:非公司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进一步讨论

1.企业资本和劳动配置决策

两税合并促进企业进入增加,进入后企业资源配置过程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两税合并对企业资本和劳动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将企业注册资金作为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度量指标,发现两税合并显著降低了注册资本金数量,意味着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规模变小了。我们前述的分析也发现,小规模企业更容易受两税合并政策的激励进入市场。这里的发现再次说明,针对全部市场主体的所得税政策产生了偏向型的政策效果。我们将企业就业创造作为劳动力配置决策的度量指标,发现两税合并并没有带来就业岗位的显著增加。因此,两税合并对企业资本与劳动配置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资本使用更谨慎,同时劳动配置没有出现明显增加。

虽然新进入企业劳动和资本配置决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张,但两税合并对存续企业的劳动和资本决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对存续企业的影响,根据方程(3)的设定形式,将被解释变量调整为企业劳动和资本配置指标。其中资本配置指标包括实收资本、负债合计、利息支出和获得贷款情况;劳动配置指标包括员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福利费总额。我们发现,两税合并促使存续企业减少了实收资本,意味着实际投入企业中的资本出现了减少,这说明企业通过某种方式减少资本金的现象是存在的。同时,我们从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我们使用企业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间的差额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并将实缴资本小于注册资本的企业作为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反之则是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我们在这两类样本中发现两税合并均显著促进企业进入增加,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更大的企业中更明显。这意味着两税合并对企业进入产生效果,一个重要途径在于通过改变企业资本配置进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我们前述分析已经证实,两税合并对小规模企业进入的影响更显著,这类企业往往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此外,小规模企业的实际税负也高于大中型企业。虽然两税合并后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出现了增加,但负债合计出现了明显降低,利息支出也出现了一定的减少,说明企业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选择外部贷款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

一个潜在的担心是政府补贴往往会成为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并有可能扭曲企业资源配置(戴小勇、成力为,2019)。我们分析了两税合并下政府补贴收入的变化,发现这一时期的政府补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降低(见表7),意味着政府补贴不会成为两税合并期间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因素。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政府补贴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差异,发现政府补贴的减少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中,这进一步减少了政府补贴对本文估计结果的担心。

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我们发现两税合并促使企业雇员规模出现了增加,说明两税合并对存续企业产生了就业扩张效应。工资总额出现了一定的增加但不显著,员工福利费总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见表7)。上述结果说明两税合并并没有促进企业更多配置资本,而是更多使用劳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具有税收层面的优势: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能在企业所得税前作为费用据实扣除,而资本配置在不同形态下扣除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更多使用劳动能获得更多税前扣除,从而降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进而降低企业缴纳的税收总额。

表7 劳动和资本配置：工业企业的数据库

变量	(1) 实收资本	(2) 负债合计	(3) 利息支出	(4) 获得贷款	(5) 政府补贴	(6) 员工人数	(7) 工资总额	(8) 福利费总额
<i>tme</i>	-2823.3914 [*] (1445.3412)	-5051.366 ^{**} (2485.6744)	-89.4080 (83.9859)	0.0228 ^{***} (0.0038)	-145.8442 (110.3008)	20.3570 ^{***} (6.1107)	528.9226 (337.1528)	76.9662 ^{**} (28.5280)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61578	2161585	2161585	1718486	2161585	2161562	1759268	1751361
adj. R ²	0.7460	0.7992	0.4431	0.0610	0.1141	0.3562	0.5236	0.3183

2. 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我们对外资企业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验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发展的影响如何；二是作为基准分析的 Placebo 检验。两税合并降低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但逐步提高了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税收是影响企业出现的重要逻辑，就会相应减少外资企业的进入数量。

两税合并的一个争议点在于外资企业是否在此过程中出现撤离，从而导致内资企业发展以损害外资企业的发展为代价。然而，目前两方面经验证据存在冲突。一是增加外资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体现在避税行为增加和身份认定操纵行为减少两方面。就外资企业的逃避税行为而言，毛程连和吉黎(2014)使用2005—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两税合并的影响，发现企业所得税率的调整导致更多外资企业出现逃避税行为。虽然两税合并给予外资企业5年过渡期，但确定性的税率增加仍有可能成为企业逃避税的重要原因。就外资身份的操纵行为而言，中国对外资企业的认定依赖商务部制定25%的外资股权身份认定标准，这就可能存在通过操纵自身外资股权比例影响身份判定的情形。二是外资企业获得了发展机会，如外资银行出现了信贷扩张，说明两税合并不一定对外资企业总具有负面影响。

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就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进行分析。我们按照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实收资本作为外资企业的判断依据，在相邻两个年度上逐一分析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我们将本年度存在且在下一年度也存在的企业定义为存续的外资企业；本年度不存在但在下一年度出现的企业定义为进入的外资企业；将本年度存在但在下一年度消失的企业定义为退出的外资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数量在城市-行业层面加总。为控制市场环境的影响，我们将方程(3)的控制变量在年份-城市-行业层面计算均值。

我们发现，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存续企业数量增加；二是进入企业出现了一定的减少；三是退出企业出现了一定的减少(见表8)。存续企业增加和退出企业减少意味着两税合并没有对外资企业数量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对外资企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两税合并对存续外资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的5年过渡期，这对外资企业税收负担的调整呈现逐步变化的特点。外资企业进入数量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税收是影响部分外资企业进入的原因而不是导致企业退出的原因，意味着税率增加对企业进入存在负面影响，与前文中我们证实税率减少促进企业进入的逻辑是一致的。因此，两税合并对存续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但减少了进入企业的数量。然而，外资企业进入数量的减少是否意味着外资在中

国出现了撤离现象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从外资企业的资本和劳动配置决策两方面进行分析。

表 8 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影响的原因

变量	(1) 存续企业	(2) 进入企业	(3) 退出企业
<i>tme</i>	0.1291** (0.0584)	-0.0147 (0.0175)	-0.0317* (0.0168)
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0270	100270	100270
adj. R ²	0.2675	0.1777	0.1743

我们在此分析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劳动和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由于企业可以通过操纵自身外资股权比例进而影响自身是否属于外资企业(包群等,2020),我们需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从而进行研究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在于,我们使用2008年两税合并前企业是否属于外资企业,作为2008年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的判断标准。使用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2008年前外资企业仍享受相对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在这一时期操纵自身为内资企业并不能最大化企业利益。同时,为避免外资企业在这一时期进入和退出的影响,我们将样本限定为持续存在的企业。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定义了2003—2013年的外资企业。我们仍然按照方程(3)的设计思路,就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两税合并导致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出现上升,这主要是由外资企业所得税率逐步提升带来的。同时,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出现了减少,说明两税合并导致外资企业的资本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同时,企业负债水平和利息支出也出现了降低,但获得贷款的机会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外资企业会主动收缩资本规模,而非信贷资源变化引起的被动收缩。虽然外资企业资本配置出现了减少,但劳动资源的配置却出现了增加,表现为企业员工人数出现了显著上升。然而,更多的劳动者却没有获得更多的工资与福利总额(见表9),意味着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转嫁到员工层面。这也意味着两税合并促进外资企业更多使用劳动并减少资本配置,同时降低了劳动力使用成本。

表 9 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依据 2007 年外资企业身份定义

变量	(1) 企业所得 税负	(2) 实收资本	(3) 负债 合计	(4) 利息 支出	(5) 获得 贷款	(6) 员工 人数	(7) 工资 总额	(8) 福利费 总额
<i>tme</i>	0.2004*** (0.0314)	-15451.650*** (3756.7677)	-1943.1249 (2829.9832)	-669.407** (288.5829)	0.0005 (0.0069)	49.6208*** (17.9869)	1035.9484 (1733.0448)	24.2497 (104.4744)
年份、月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行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市级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7594	99412	99416	99416	99416	99416	83988	83716
adj. R ²	0.1165	0.5181	0.9049	0.4739	0.1822	0.4986	0.6049	0.3941

我们需要进一步排除两税合并中潜在政策预期效应的影响,即如果2007年外资企业出现亏损同时减少外资股权比例转设为内资企业,那么,我们上述估计中仍可能包含这部分企业。为此,我们调整外资企业身份认定,按照2006年实收资本认定外资企业的身份,作为2008年后外资企业身份的认定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问题对本文结果估计的影响。我们发现,即便调整了外资企业身份认定标准,我们上述结论仍是稳健的。

六、结论和启示

随着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日益凸显,从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角度理解企业出现的逻辑,已经难以解释近年来中国企业快速增加和关联性不断强化的趋势。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不能仅依赖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外部刺激,更需要市场主体的企业家精神,即不断有新的企业进入市场。以税收为代表的宏观政策在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这一点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分析。

我们采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所得税调整政策,即2008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将内资企业法定所得税率从33%降低至25%,由此产生了较强的税收激励,对研究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受到税收激励而出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搜集和整理了2006—2008年每天设立全部市场主体的名单,并通过与企查查和天眼查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年-月-城市-行业层面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数据,并采用年月DID的研究方式,证实了税收激励是影响企业出现的重要逻辑。虽然2008年存在金融危机,但税收激励仍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入,这一现象难以从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的视角进行解释。我们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排除了竞争性假说并剔除了未观测因素和趋势性因素的影响,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虽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是“一刀切”政策,但产生了针对小规模企业、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减少企业退出偏向的特点,有助于市场主体的不断进入和发展。

我们从税收负担和企业关联两个层面验证了这种内在机制。我们使用2003—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证实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减少是促进企业进入的重要原因。我们基于每家母公司所包含的子公司、分公司、下设分支机构和其他关联机构的信息,通过研究两税合并政策对企业内外部关联网络的影响,进而分析企业的进入决策。研究发现两税合并提高了企业内部关联和外部关联度,助力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机会,从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方式,以及对外资的影响,发现新进入企业规模较小,降低了市场中注册资本金数额,同时这一过程并没有伴随明显的就业创造过程。虽然两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资企业数量,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出现了增加,意味着两税合并并没有减少外资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内资企业的发展并没有以损害外资企业的发展为代价。

我们从税收理解企业出现的研究视角显著区别于现有从社会分工与交易成本解释企业出现的研究视角,证实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是实际存在的,并开始成为影响企业出现的重要因素。这补充了现有研究就税收政策针对存续企业的分析,从扩展边际为理解税收政策的社会效益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促进企业家精神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中国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对存续企业,还体现为促进大量企业出现,使企业家精神得

到弘扬。这种企业出现的税收逻辑,为理解中国企业快速出现和企业间构建日益复杂的网络结构具有重要帮助。

参考文献:

- 1.包群、但佳丽、张志强:《外资身份的重要性:基于外资股权限定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20年第7期。
- 2.陈钊、王旸:《“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 3.戴小勇、成力为:《产业政策如何更有效: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加成率的证据》,《世界经济》2019年第3期。
- 4.杜鹏程、王妹勋、徐舒:《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 5.樊勇、李昊楠、管淳:《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间断点是否存在聚束效应》,《世界经济》2020年第3期。
- 6.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 7.贾俊雪:《中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态势及其稳定效应》,《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
- 8.李昊楠、郭彦男:《小微企业减税、纳税遵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2021年第10期。
- 9.刘勇政、吕冰洋、李岩:《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税制的激励作用》,《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 10.刘志阔、陈钊、吴辉航、张瑶:《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下的中国经验》,《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 11.毛程连、吉黎:《税率对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世界经济》2014年第6期。
- 12.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 13.沈剑飞:《流通活动、市场分割与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
- 14.沈坤荣、余吉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
- 15.王伟同、李秀华、陆毅:《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 16.杨国超、李晓溪、龚强:《长痛还是短痛?——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刺激政策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3期。
- 17.叶宁华、张伯伟:《地方保护,所有制差异与企业市场扩张选择》,《世界经济》2017年第6期。
- 18.赵颖:《减税激励与小微企业发展——基于所得税减半征收的证据》,《经济动态》2022年第5期。
- 19.赵颖、鲁元平、王熙、杨国超:《纳税人身份选择与就业机会——来自全国工商与税务匹配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
- 20.赵颖、鲁元平、杨国超:《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内分工?》,《管理世界》2024年第1期。
- 21.朱貽庭主编《应用伦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
- 22.Acemoglu, D., & Johnson, S.,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3, No.5, 2005, pp.949-995.
- 23.Allen, F., Cai, J., Gu, X., Qian, J., Zhao, L., & Zhu, W., Ownership Network and Firm Growth: What Do Five Million Companies Tell about Chinese Economy. <https://ssrn.com/abstract=3465126>, 2019.
- 24.Bai, C. E., Hsieh, C. T., Song, Z. M., & Wang, X., The Rise of State-Connected Private Owners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28170, 2020.
- 25.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1990, pp.893-921.
- 26.Becker, G. S., & Murphy, K. M.,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7, No.4, 1992, pp. 1137-1160.
- 27.Becker, S. O., Egger, H., Koch, M., & Muendler, M. A., Tasks, Occupation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an Open Economy, WTO/Geneva, 2019.
- 28.Beer, S., De Mooij, R., & Liu, L.,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 Review of the Channels, Magnitudes, and Blind Spot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 34, No. 3, 2020, pp. 660-688.
- 29.Bloom, N., Eifert, B., Mahajan, A., McKenzie, D., & Roberts, J., Does Management Matter?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8, No.1, 2013, pp. 1–51.

30.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7, No.2, 2012, pp.339–351.

31. Brandt, L., Dai, R., Kambourov, G., Storesletten, K., & Zhang, X.,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DP17131, 2022.

32.Chen, S. X.,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47, No.5, 2017, pp.62–76.

33.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1937, pp.386–405.

34.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56, No.4, 2013, pp.837–877.

35.De Neve, J. E., Imbert, C., Spinnewijn, J., Tsankova, T., & Luts, M., How to Improve Tax Compliance?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Wide Experiments in Belg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29, No.5, 2021, pp.1425–1463.

36.Dwenger, N., & Treber, L., Shaming for Tax Enforcement. *Management Science*, Vol.68, No.11, 2022, pp.8202–8233.

37.Fan, H., Liu, Y., Qian, N., & Wen, J., Computerizing Vat Invoices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24414, 2018.

38.Fuest, C., Peichl, A., & Siegloch, S., Do Higher Corporate Taxes Reduce Wages? Micro Evidence from German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8, No.2, 2018, pp.393–418.

39.Hsieh, C. T., &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4, No.4, 2009, pp.1403–1448.

40.IMF, Current Challenges in Revenue Mobilization – Improving Tax Compliance. Policy Papers, 2015.

41.Jones, C. I., & Kim, J., 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Top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6, No.5, 2018, pp.1785–1826.

42.Lerner, J., & Schoar, A., Does Legal Enforcement Affect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e Contractual Channel in Private Equ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0, No.1, 2005, pp.223–246.

43.Levy, S., *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44.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ume one*, London: Printed for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Why Enterprises Enter the Market Counter-Cycl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Incentives

ZHAO Ying, HE Tianxia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Summary: As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nd the increasing correl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nsaction cos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y cannot rely solely on external stimulus such as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it also requires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market entities, i.e. more startups to enter the market.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he biggest adjustment China made to the income tax policy in history, namely,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that came into effect in 2008 to reduce the statutory income tax rate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from 33% to 25%.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has created a strong tax incentive for enterprises, making the law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study to find out whether and how enterprises are motivated by tax incentives. We collected the list of all market entities established from 2006 to 2008, and by matching it with Qichacha and Tianyancha data, we constructed data on new entrants to the market at the year-month-city-industry level. We used the year-month DID research method to confirm that tax incentive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emergence of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ax incentiv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market. We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The logic of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that the tax incentives lighten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burden and increase corporate connections. (3) The reform has produced a biased effect, with the number of smaller and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while that of exits of enterprises has decreased. (4)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relations of enterprises began to increase during this process. A certain degree of substitution of labor for capital occurred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orm has not reduced the willingness of foreign capital to inves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has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logic for the counter-cyclical entry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ation, enriching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nsaction costs. As the role of modern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mprove, public policies represented by the taxation policy hav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mergence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come tax incentives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tends to focus on the incentives associated with the commodity turnover tax. The commodity turnover tax is ultimately borne by the end consumer and the tax burden can be shifted. In contrast,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is borne by enterprises, difficult to pass on, and only levied on positive taxable income,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taxing added value model and reduces the burden on the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r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ample that includes all market entities, including self-employed individuals,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and medium and large enterprises,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 of previous research that limited their research to specific type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es China's daily national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and tax information data from 2006 to 2008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entities with different tax status in entering the market against the tax policy background.

Keywords: Emergence of Enterprises, Tax Incentive, Enterprise Associ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JEL: H25, H71, L25

责任编辑: 馨 兰